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九〇期 ——  
(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708a)

---

【本刊专稿】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	余汝信
【亲历者言】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的序幕	杨福云
【回首文革】袁升平文革回忆录 (节选一)	袁升平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本刊专稿】

### 军委办事组前期的几个问题

• 余汝信 •

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期间军队系统的一个极重要机构。去年出版后引起颇大反响的《吴法宪回忆录》，有一节为“军委办事组的成立”。然而，遗憾的是，作为这一重要机构的主要成员，吴法宪对该机构成立的初衷及前期活动的回忆，均有不太准确之处。为此，本文依据较为可靠的材料，对吴著的失实处提出不同的看法，对吴著的一些重要遗漏予以补充，以供讨论参考。

#### 一、是否存在一个“三人小组”？

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以前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罗瑞卿、贺龙等人先后被打倒，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成立了一个由叶剑英、杨成武和萧华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页676。下文引自同书者，仅注页数不再注书名。）

文化大革命前，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机构，为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秘书长主持。贺龙作为军委第二副主席，并不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军委常委、秘书长罗瑞卿在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前倒可以说是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文革前夕，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为罗瑞

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张爱萍，1965年11—12月萧向荣、罗瑞卿先后受审查后，成员余杨成武、萧华、邱会作、张爱萍四人。1966年5月，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苏振华、萧华、杨成武、王新亭），自此，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杨成武、萧华既为军委副秘书长，又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分别又是代总长、总政主任，权责集中于叶、杨、萧三人，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两位副秘书长苏振华、王新亭不是办公会议成员，而办公会议成员邱会作、张爱萍又不是副秘书长），惟军委是否郑重其事地成立过一个如吴所称的、经毛泽东同意的“三人小组”，则大有疑问，起码目前在任何军方正式编纂的资料中均未见记载。（1）

## 二、成立看守小组是谁的提议？

吴：“大约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初，毛泽东到南方去巡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军委决定，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政委李作鹏随同前往。这时，叶帅已因‘二月逆流’事件靠边站了，萧华也被轰得不能工作，杨成武再一走，‘三人小组’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名义向林彪提出：‘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提出由我、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这个看守小组，由我任组长。”（页676）

以上吴所说1967年毛泽东南巡的时间欠准确。毛乘专列离京的时间为7月14日。（2）随同毛专列离京的是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余立金早于6月下旬随谢富治、王力到西南解决当地问题，7月14日随谢、王到武汉，当时并无负责毛安全的任务。李作鹏14日凌晨随周恩来到汉，为毛泽东打前站。

惟吴上文最有疑问的是所谓周恩来的那段话，吴用以表明军委看守小组是周恩来向林彪提议成立的，并得到林彪的同意，人员还是林彪指定的。

笔者认为，目前有关军委办事组前期活动最具权威性的论述，为王年一于2001年发表的《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3）王年一该文引述了江青1968年10月30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一段话：“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开始是4个人。……”

王年一所引述的江青讲话，来源是可靠的，且接近历史真相，那就是——看守小组（江青称看管小组）是江青提议成立的，得周恩来的同意，而并非是周提议，林彪批准。该小组开始时只是临设机构，其组成应毋须经毛、林批准，除吴法宪上文外，我们亦未见过任何周恩来提议、林彪批准成立并亲定该小组成员名单的材料。

## 三、看守小组成立时间及成员

吴：“七月十七日，我接到通知，要我当晚去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宣布：‘经毛主席批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三人组成中央军委临时看守小组，由吴法宪任组长。……’”（页676）

吴文有关看守小组成立的日期有误，小组组成人员也有遗漏。

1967年7月17日，周恩来不在北京而在武汉。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15日

一18日，周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7月17日，到梅岭一号毛泽东处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问题和武汉问题。7月18日晚，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4）记述周恩来此一时期活动甚详的《陈再道回忆录》下卷及《王力反思录》，也证实了《周恩来年谱》以上记载的准确性。（5）这些材料皆可以说明，7月17日晚，周恩来不可能在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换言之，也不可能在京宣布看守小组的成立。

看守小组宣布成立的准确时间，应为1967年8月17日，成员四人。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引述了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报告，内称：“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官方编纂的军队组织史资料亦称：“1967年8月17日，成立由吴法宪（负责）、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四人小组。”（6）

军委办事组的报告可以印证，成立看守小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8月17日的“指示”（报告未有提及毛泽东和林彪）。同时，证实小组成员为吴、叶、邱、张四人，而不是吴法宪回忆中的三人。四人当时的职务是：吴法宪，空军党委第一书记，司令员；叶群，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林办主任；邱会作，总后党委第一书记，总后部长，原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张秀川，海军党委常委，海军政治部主任。

#### 四、看守小组成立初衷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两次引述所谓周恩来称：“是不是先成立一个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之下，暂时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周又称：“临时看守小组的任务是，接受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交代的任务，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页676）

吴的回忆有误。事实上，成立看守小组的初衷，是因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相继瘫痪，欲以其取代上述两机构负责指导总政及其他军队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工作的职能。直至1968年3月前，看守小组及后来的军委办事组，皆无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权限。在这一点上，王年一引述的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报告已说明得很清楚：“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 五、杨成武任办事组组长

吴：“九月二十六日，杨成武回到北京。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周恩来就宣布撤销了看守小组，另外成立以杨成武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我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同杨成武一起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页677）

吴上述回忆还是多处有误。首先是日期。据可靠材料，杨成武随毛泽东的专列应在1967年9月22日已返抵北京。（6）据王年一引述的军委办事组10月15日报告：“9月24

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引述的报告说明，办事组成立日期应定在9月24日为宜。该报告还说明，吴上述撤销看守小组，另外成立军委办事组的说法有违史实。军委办事组是看守小组的延续，只不过在9月24日前名称是不太确定的，或称四人小组，或称看守小组，又或称办事组，9月24日后才有一正式确定的名称而已。除增加杨成武外，其他成员未有变化，吴提及“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其实叶群、邱会作早在看守小组时期已是成员，而李作鹏应为张秀川之误，李1967年9月尚非办事组成员，他迟于1968年3月办事组改组时才替代张秀川进入办事组。

杨成武此时是个红人，是毛、林、周及中央文革小组都能接受的人物。王年一引述军委办事组的报告还称：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1967年10月16日，周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

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10月27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批示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泽东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7）

根据以上周、康、林的批示，三人对取消军委办事组一议均未置可否，毛说“恐怕不妥”，自然也就不会取消了。此外，在杨、吴10月27日报告前，林彪对军委办事组成立一事是否知情，尚大有疑问。

六、周恩来：“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吴：“与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实际上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一样，我们的这个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以前军委的正、副秘书长。”（页677）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是否行使中央常委会议的职权，这里暂且不论，“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说法却值得商榷。实际上只有高一层次的“军委常委会议”和低一层次的“军委办公会议”，并没有“军委常委办公会议”一说。而本文第四节已说明，直至1968年3月前，军委办事组甚至不具备军委办公会议的职能，更遑论军委常委会议了！从军委办事组成立后的1967年10月至1968年2月，军委常委会议如常举行，据《聂荣臻年谱》记载，此期间军委常委会议举行过15次，即从1967年10月14日第九十七次至1968年2月22日的第一一一次，第一一一次是1960年代的最后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飞机发展问题的建议，海军拟组建一个歼击机师等问题。”（8）

军委常委不再开会，是自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军委办事组改组始。提议者是当时中共的第三号人物——周恩来！

据王年一文：1968年3月25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

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5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呈主席批示。”毛指示照办。

王年一文内又称：1968年3月28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王年一引述黄永胜、吴法宪1968年4月1日给毛、林、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的报告称：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批示：“此事待议。”而事情尚在“待议”中，4月4日，李天佑（副总参谋长）却已以书面形式报告黄永胜：文件已立即停送徐向前、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今天回过头来看，黄、吴、李在停发军委常委文件一事上做得是有点过于积极，但此事与林彪却无关。

王年一还说，1968年6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吴法宪说：“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

吴法宪当年的表述是准确到位的。1968年3月以后，军委办事组实际上代替的，是“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在这一点上，回忆录的表述就有点儿含混不清，而且，对其职能未有划分为1968年3月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 七、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吗？

吴：“军委办事组对下不单独行文，不发文件，不下命令。实际上是一个办事机构。”（页677）

吴此说不确。恰恰相反，自1968年3月以后，军委办事组以自身名义向军内下发文件，下达命令已很常见。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作大事记》（北京：总参谋部，1988年12月）及其他有关资料记载，军委办事组在1968年3月至1969年12月期间上报的报告，下发的文件，下达的命令、指示即有：

1968年4月26日，军委办事组下发《关于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规定》。6月12日，军委办事组对上述规定作了补充。1969年1月11日，办事组对部队调动使用权限规定又作了补充。

5月14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从部队挑选飞行学员的通知》。

9月16日，军委办事组上报从一九六八年秋冬至一九七〇年上半年陆军军分批调整部署的报告。

11月26日，军委办事组以（68）19号军委文件发出《座谈会纪要》，内中主要谈及

大军区以上机关精简工作问题。

1969年1月10日，军委办事组重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使用权限的八条规定。

2月2日，军委办事组决定，将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

2月19日，军委办事组转发《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对军队院校进行调整，裁减82所，保留43所。

5月2日—6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研究设防、防空降等问题，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这次会议纪要，经毛、林批准，于6月18日以（69）9号军委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

6月13日，军委办事组公布经毛泽东批准的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方案。

6月20日—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0日，毛泽东对该次会议纪要批示：已阅照办。

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9月4日，军委办事组公布《大军区机关精简方案》。

9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后，军委办事组于1970年1月7日将其印发全军。

10月18日，遵照军委办事组批示，总参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副主席紧急战备指示（第一个号令）”、林彪给第二炮兵的指示（第二个号令）、军委办事组给各总部、各兵种、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总参各有关部门的指示（第三、四个号令）。

11月2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打坦克、打飞机训练的指示》。

11月28日，军委办事组公布《总政治部机关精简方案》。

以上记载应不甚完全，但已应很能说明问题。

## 八、办事组成员

吴：（除杨成武、吴法宪外）“我们这个办事组的成员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以后屡有变动，先后参加过军委办事组的有黄永胜（杨成武被打倒后，由黄永胜接任军委办事组的组长）、谢富治、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纪登奎、张才千等人。”（页677）

吴法宪的回忆，遗漏了张秀川、李天焕、刘锦平、李天佑四人。关于李作鹏替代张秀川，见本文第五节。而据解放军组织史资料，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刘锦平（空军党委常委，民航总局政委）于1967年11月增补为军委办事组成员。（9）

据王年一文，1968年3月30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5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事组。……”

李、刘两人在军委办事组改组后不再是成员。算起来，在军委办事组的时间，尚不足五个月。

关于李天佑，王年一在文中引述黄永胜1968年11月18日给毛、林、周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报告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陈伯达、姚文元11月22日批：“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黄永胜于11月24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由于中央文革的干预，李天佑延至1969年4月九届一中全会经毛、林批准方为办事组成员。（10）（2007年6月）

注释：

- （1）本节资料来源参见总政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五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12月）。
- （2）铁道部专运处编：《铁道部专运处四十五年》（北京，1998），页117。另一说法为7月13日下午离京，经郑州停留，14日抵武汉。
- （3）（7）见北京《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页45—48。以下本文引用王年一的论述全部出自该文，不另一一说明。
-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页170—171。
- （5）《陈再道回忆录（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页319—322；《王力反思录（下）》（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页1006—1007。
- （6）同（2）书，页117。
- （8）《聂荣臻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1092。
- （9）同（1）书，第五卷，页4。
- （10）同（1）书，第五卷，页7。

~~~~~

## 【亲历者言】

### 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斗争的序幕

• 杨福云 •

从1970年3月起，我参加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具体工作，了解一些修改宪法的情况，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1970年修改五四宪法（即1954年制定的宪法）时，对设不设国家主席产生了不同意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而在中央政治局历次会议上并未就此发生争论，表面上显得很平静。然而毛、林的不同意见，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而发生的激烈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 ◇ 问题的提出

1970年3月17日晚上，康生、张春桥到中南海怀仁堂西厅向毛选五卷整理小组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布置整理小组具体作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他话不多，给人以冷峻、莫测、工于心计的感觉。

康生说：“3月8日，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毛泽东是在武汉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总理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3月8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决定立即开始进行相关工作：（一）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并约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商量；（二）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工作，先将修改要点写出，至4月8日完成修改工作；（三）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稿，集中讲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等。这几条，就是《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的主要内容。

康生说：“今天（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的同志都拥护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康生这里讲到的中央工作会议，是3月17日～20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103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修改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一致赞成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由各地、各部门选举为四届人大代表；讨论、修改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协商和调整方案；关于各地、各部门候选代表的推选工作和修改宪法进一步征求意见的部署。

康生说完后，张春桥简单说了几句，意思是大家没有搞过宪法，不要怕，大胆工作，出了错也不要紧。

康生、张春桥要求我们立即开始修改宪法的工作：

一、按《请示》确定的指导思想修改。

二、先起草序言和总纲；序言的篇幅不要超过1954年宪法序言太多，约1000字；序言的语言尽可能与九大通过的党章一致。

三、总纲里可以写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毛主席名字前不要加形容词（康、张没有说明是什么形容词，但大家都明白，因为当时固定化的形容词有“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因为形容词加得越多，毛主席就勾得越厉害。

四、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宪法要短，不能长了。”修改后的宪法要比五四宪法大大简化，五四宪法106条，修改后的宪法只要几十条。



五、一周内修改出一个草稿，两周后即3月31日送政治局讨论。

会后，我们即不分昼夜地进行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经过一周的奋斗，拿出了一份草案。这个草案，突出了共产党的领导，国家性质将“人民民主国家”改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由五种所有制改写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增写了人民公社、“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不设检察院、国防委员会，地方政府由人民委员会改成革命委员会。这个宪法草案只有60条，比五四宪法少了46条。

对60条的宪法修改草案，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多次讨论。7月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时，江青提出这个方案还太长了，记不住。政治局委员们提出了几种修改方案。周总理说：“序言不动，总纲和权利义务合并，国家机构还要，简化；民族部分保留，也简化。”

按照周总理的意见，我们又突击修改，几天之内拿出了一份30条的宪法修改草案，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时还搞了一份70条的修改方案。

#### ◇ 毛、林的分歧

在起草修改草案过程中，先后两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

一次是：4月11日，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11日夜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叫秘书于运深打电话给中央政治局，提出：“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和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电话记录）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一次是：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并借用了三国故事。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原文是：“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曹取书拆视之，略曰：

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早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

曹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毛泽东此时讲这个三国故事，显然是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事。有一点要特别强调的，根据毛泽东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我们先后起草的三个修改草案（60条、30条、70条）都没有写“国家主席”的条文，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草案时也没有人提出写“国家主席”的条文。

但是，林彪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儿摆？”这里说出了林彪及其一伙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意图。

#### ◇ 表面的平静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工作计划包括：（一）建议成立由毛泽东、林彪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二）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完成宪法修改的准备工作，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同时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三）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四）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召开四届人大会议。次日，周恩来将工作计划稿分别报送毛泽东、林彪。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57人，毛泽东、林彪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17日大会。18日开始小组讨论。

18日下午，周总理参加东北、西南组会议，我也去这组听会。

东北、西南组的委员包括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中央委员。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看来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第一个发言的是辽宁的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总理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周总理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总理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从大家的眼神、表情可以看出，所有与会者听了总理的话，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当时最具政治性、最尖锐、最敏感、最不能议论的问题。而今天，总理以如此明确的态度，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几年里风靡全国的说法、做法，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正确的态度，自然震惊不小。

总理讲完，继续讨论。讨论中涉及不少问题。在议论到《通知》没有写不设国家主席这一内容时，周总理说：原来写了，后来考虑，还是不写好，口头上对群众讲，是否可以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实际上只接受国书，可以不设。但要注意讲清楚：在宪法上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我们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

下午的讨论会，相当活跃，大家都很高兴。据我的感觉，很大程度是因为周总理在场。这是我作为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我都感受到、看到，周总理走到哪里，都给人们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让人感到特别亲切，气氛融洽、活跃。

7月18日晚，中南组开会。中南组五位委员，是五省的第一书记，但都有军职，所以穿军装。参加这个小组的五位政治局委员也是军人，两位记录也都是军人。只有我这个旁听会议意见的是老百姓。朱总司令、叶帅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人们对他们怀着明显的尊敬。朱总司令我已见过几次。我们在中南海丙楼办公，朱总司令住处紧挨丙楼西南角（后来搬出了中南海），是近邻。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大姐在院子里散步时，有时遇上还说几句话。叶帅是第一次见面，给我的感觉是气宇轩昂，又文质彬彬。黄永胜、李作鹏也是第一次见。对黄永胜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会议开始后，他老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说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对李作鹏的感觉是一个字：冷。这也许是他带着黑色眼镜，面无表情。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问好，并一面说：哎，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她还没有吃晚饭，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叶群表示着歉意。与会者有人说：叶群同志真辛苦，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想，反正迟到了，何不在休息室吃完了再进来，真是！这十位，都是不久以后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的参加者，而讨论的问题，两个会议都以宪法为议题，一个是完全讨论修改宪法，一个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为议程之一。因此，这次会议密切关系到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那场斗争。

在中南组小组会上，主要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通知》、宪法序言和总纲。委员们对《通知》中没说设国家主席一事有意见。中途参加中南组讨论的康生对此作了解释。叶剑英、李作鹏就回去怎么传达说了自己的意见。讨论中议论最多的是国家的性质如何表述、要不要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存在、怎样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宪法等问题。

每天晚上小组会结束后，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就集中汇报各组情况，将各组意见汇集在一起，最后形成简报，报中央政治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在这次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小组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宪法草案上也从来没有写上）。

在会有少数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知道后，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说：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和各地报来的意见。会议确定：

（一）序言不与总纲合并，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二）宪法结构不变。（三）宪法为“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这次会议是讨论工作，否定了一些意见，但并没有争执。一些文章和著作说，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要不要在宪法上写国家主席的条文，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之间爆发了一场

论战，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我们逐条研究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各省、市、自治区报来的意见，对宪法修改草案（三十条）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多为文字性的，实质性的内容最重要的是增加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是8月12日我们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请示康生后加的，加在序言里。8月13日，经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的第二条。

1970年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至8月13日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等待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听取全会的意见，再作修改。人们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 《中国人大》半月刊 2003年6月

~~~~~

### 【回首文革】

#### 袁升平文革回忆录（节选一）

• 袁升平 •

编者按：袁升平将军曾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 ◇ 意料不到的转向

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更不是纪登奎电话说的毛主席“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同志和我。方向完全变了，气氛变了，范围也由8人扩大到25人，省里地委以上、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会议完全由“四人帮”控制，江青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江青一伙倾巢出动，利用青岛某驻军少数领导同志对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不同意见，策动下面反，他们在上面压，借题发挥，上下夹击。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同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妄图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在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华东大组别的小组也写了，而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当时陈伯达同林彪的阴谋勾当，我们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除林彪死党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没有追究当时上当受骗的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是中央办公厅有人搞的鬼，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杨得志同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秘密报告了江青一伙，江青斥责我们“搞小动作”，

组织专场专题批斗。我们不服，他们又抛出一个“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话出自于这些人之口，其分量的确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副司令员、省委常务副书记张铨秀同志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铨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经受了考验，没有出任何问题。

当我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后，原来捏着一把汗的同志恍然大悟，但“四人帮”和少数追随者不相信我的陈述，说我是“诡辩”。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同志说了实话：“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因为江青一伙的既定方针是要整人，他们又抓住我们在庐山大树下议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硬逼我们承认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华东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我们没有发言也成了罪状，说什么“不发言，就是没有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他们还指责我们，“九·一三”以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其实，到开会时为止，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山东地区军内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已基本查清。后来，1973～1975年他们大搞“批林揭袁”，也没有搞出任何超过我们主持清查工作时的问题来。江青更是大骂：“山东政治谣言这么多，中央派人去不尊重，后台就是你袁升平！”所有她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据理说明真象，有些问题还“上纲上线”，违心地作了一些检查。但江青仗势压人，蛮不讲理，不时拍着桌子叫嚷：“你还强词夺理，我这里有证据！”甚至破口大骂“你袁升平是个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讲话。会议后一段，我们索性什么也不讲了。

尽管江青一伙咄咄逼人，并有少数人追随他们，提供“炮弹”，但到会多数同志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还是了解、信任的，对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进行了抵制。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江青一伙和少数人硬要坚持点名批判我们，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同志认为，22名到会同志一致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调子低，拒绝在文件上签名。×××同志个人另写了一份与22人对立的报告，同时送给姚文元。姚文元以此欺骗主席，搞成“不点名的点名”，就是点职务，形成中发〔1973〕4号文件，作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错误结论。在这过程中，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同志曾不平地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这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破口大骂：“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你们赶紧查，一定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物！”随即，强令以省委在京五常委名义，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撤销了他在省革委的党内外职务。会后关押审查，没有查出他与林立果有丝毫的牵连。一个耿直正派的同志，就这样凭空遭受迫害。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如实说明了一个情况，江青竟就他的名字大兴问罪：“你什么方正，我看你既不方，又不正！”妄图以这些杀鸡给猴看，压制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同志。

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围绕着庐山问题，我们违心地作了三次书面检讨，遭受几十次批斗，江青一伙还是不让过关；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又始终不屈服，会议开成僵局。

#### ◇ 总理为我们解围

所谓“山东青岛汇报会议”开到第四十五天，即12月31日，1973年新年前的除夕，原来姚文元已通知开全体会议，继续批判刘文欣同志，打我们的态度。下午3时，大家都到了会议室，等候江青一伙的到来，气氛十分紧张。

正在这时，周总理意外地来到我们开会的京西宾馆，亲切地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同志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大家的情绪，犹如雨过天晴，闷气消散了。随后，总理主持接见了省委在京5常委。总理看出了江青一伙妄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当着他们的面明确地指出：“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听了总理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到底还是总理了解我们。总理想得十分周到，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在总理的关怀下，会议出现了新的转折。

江青也顺势变换嘴脸，“打”不成，又使出了“拉”的一手。不仅除夕同我们“共进晚餐”，而且第二天，还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1973年元旦。”我当时意识到，江青不提我的名字，是别有用心的。

元月8日，江青又“邀”省委五常委到钓鱼台她家里“作客”，一边打扑克，一边吹嘘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光荣历史”。临走，送给两样礼物：一是主席1935年在延安的大幅照片，二是送给杨得志同志几个辣椒。这两样礼物都有她的用意：前者是炫耀她的政治资本，后者显示她的风格，辣椒是辣的，我是不好惹的。

最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接见到会的全体同志。江青杀气腾腾地要“见识”一下刘文欣同志，企图当场扣押。总理和蔼地把刘放回宾馆。总理对大家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的检查报告，政治局通过了，还要送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24位（刘文欣同志已被江青一伙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谈一下，回去向两个常委谈一下，就不再传了。”“回去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请示报告只发到县团。”叶剑英副主席也鼓励我们：“杨得志、袁升平同志不要顾虑这次回去威信会受到影响，不好工作了，经过这次会议，威信可能更高了。”

而江青一伙还继续搞阴谋诡计，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四次提出：“你们的邻省有什么谣言不要受影响，不要动摇”，“这一点很重要”，“以后千万不要听邻省的话”，“你们那些邻居的话可是听不得啊！”这是把矛头指向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原来，江青一伙不仅要整我们，而且要通过整我们打开突破口，进而整倒华东三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怪不得江青在她家里指着厚厚一叠材料说：“我这里有南边那两位的‘重型炮弹’！”并在整我们期间，把许世友同志叫到北京，质问庐山“表态信”问题，总理得知后才解了围：“问题搞清了，许世友同志感冒有病，先住院。”送三〇一医院几天后，放回了南京。

1月9日，我们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总理出于阻止江青一伙妄图扩大势态继续整人的阴谋，给了我们一封亲笔信，对我们的问题定了基调（因根据当时所谓揭发批判的问题作的归纳，错误事实未经核对，难免有出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用意是保护我们），并指示省委五常委回去传达时，“凡是外省现尚负责的有关同志，一律不提。”

## ◇ 落井下石

历时53天的北京挨整会议结束后，我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回到济南。我明白，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尽管周总理保护，但江青一伙另搞一套是非常明显的，张春桥在北京会议结束时就叫嚷“要坚决按北京会议的路子走下去！”

春节过后，1973年2月11日，省委和军区两常委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京会议精神。我和杨得志同志共事多年，他很谦逊，我尊重他，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关系融洽，心情舒畅。军区和省委，上上下下，历来都是“杨、袁”并称。北京挨整，虽然庐山会议他是大组副召集人和小组召集人，“表态信”是他提议并主持写的，我只是一般成员签名之一，省委和军区他都是第一把手，而且在北京也是重点整他，但我始终没有认为自己责任轻，或因江青一伙点我的问题较少而推卸责任，更没有考虑过要两人分开，具体澄清责任是非。一直是同挨批斗，共历患难。三次违心的书面检讨，都是两人联名写的，我觉得这是自己应有的姿态。因此，传达时也很自然地由杨得志同志代表两人宣读一个稿子。这是完全正常的。

不科，这一正常情况，竟被有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加以歪曲。他们起哄说：“两人的错误由杨得志一人念检讨，袁升平不表态，就是不认账，准备翻案。”持这种谬论的人，尽管在参加会议的地、师以上干部七百余人中为数甚少，但能量不小，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江青一伙盗用中央名义，立即发来电报，指责我“不表态是错误的”，勒令我单独重新检讨。这一下，那少数起哄的人劲头更足了，有的竟然指着杨得志同志和我的鼻子，进行人身攻击。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出来表演了。我们军区党委常委一班人，当时14人，本来互相之间是很团结、很体谅的，听说我们在北京挨了整，回济南那天，全体到机场迎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后来的斗争中，绝大多数同志也是坚持党的原则，实事求是。但是，也有一个人，本来是个老同志，“九大”后林彪把他下放到济南军区当副司令，杨得志和我对他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照顾。不科，正当江青一伙策划“杨袁分开”，勒令我单独检讨，图谋把我抛出，而苦于“材料”不足的时候，这位老同志投其所好，竟无中生有地进行所谓揭发，说我在“九·一三”事件，传达中央57号文件时，“泣不成声，话都说不下去了”，“林彪机毁人亡，毛主席安然无恙，你不是哭林彪是哭谁？”1月19日，他又写成文字正式上报。他的这块“巨石”，打在我身上，立即在会上掀起一股浊浪。那些过去跟着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投机分子“反戈一击，揭发立功”；不明真象的同志，不知所措；正义的人们，虽有怀疑，但也暂时不敢讲话；操纵会议的人，如获至宝，连夜派人将揭发信送往江青、张春桥一伙。

当时，我当然要说明真像，要反驳诬陷。可是，在那时，我说的再多、再具体、再真实，也是无用的。然而，我是决不后退的。

1973年4月9日，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申述：

……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将我当时的真实心情，向主席、中央报告如下：1971年9月17日（或18日），许世友同志等从北京开会返回途中，路过济南，我和杨得志同志在车站见到了他们。见面后，许等人向我们讲了林彪死党陈励耘、王维国一伙，妄图在杭州、上海等地谋害毛主席的种种罪恶阴谋和毒辣手段。我们听了以后，既愤恨，又沉重，确实感到第十次路线斗争惊心动魄。9月22日，省委、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文件。杨得志同志传达完文件后，我接着发言，首先我表示完全拥护中央文件，完全拥护主席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采取的英明决策。尔后，揭发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当我谈到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主席时，想起了许世友同志等讲的那些内容，感到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没有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主席那样高龄了，仍然夜以继日为革命操劳，而林彪如此丧

心病狂，要向主席下毒手，顿时心情激动，止不住了，流了泪，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情。

这封信，在当时情况下，毛主席能否看到，我不得而知，但从事情的发展看，掌握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江青一伙，对我的申述不予理睬，而以“哭林”为“重炮”继续整我。

然而，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那位老同志的所谓“揭发”，根本就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22日，如此重大的原则立场问题，为什么他当时不揭发，而在事隔1年零4个月以后的1973年1月才揭发呢？当时参加会议的有22位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别人都没有这种感觉，而惟独他有如此感觉呢？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揭发问题”是幌子，邀功领赏是目的。果然，凭一纸小报告，他很快当上了总后勤部部长。尝到甜头后，他又写了一份又一份整中央和军委老同志的小报告，献给“女皇”，进一步卖身投靠于江青反革命集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又查到了当时的会议原始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我的发言内容：

袁：

一致意见，紧跟主席。  
林叛国，是阴谋总暴露。  
他利用毛主席的最高威望，搞两面派。  
打着红旗反红旗，假装正确。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  
尽管林取得了一时的威信，当其叛党叛国，就身败名裂。  
我们从中得到很大教育，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哪条路线是错误的，对伟大领袖阶级感情更深厚，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提高警惕。  
不断剥掉其画皮，揭露其反革命本质。和他划清界限。  
战备工作加强抓紧。  
团结问题。军内外都要团结起来。  
有主席健在、掌舵，任何风浪都能经得住。  
保密工作。

袁：

是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影响不能低估，要做好工作，加强战备。  
今天叛国，是我们的敌人，全党全国全军的敌人。  
虽然出了一一，革命终将前进，终得胜利。

这个记录，对主席的感情，对林彪的鞭笞，对工作的部署，对革命的信心，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谎言终于被彻底戳穿了。当时到会多数同志也写出了否定诬陷的旁证。1977年11月13日，当时的中央专案组正式结论，推翻了诬陷我的所谓“哭林”问题。

#### ◇ 新的阴谋

济南南郊会议开了47天，3月29日结束。由于绝大多数同志还是正直的，对山东问题的



历史和现状，抱有正确的认识，主张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贯彻落实北京会议精神。因此，会议结束时，经两家常委讨论通过的总结，还是“杨、袁”并称，并仍以北京会议对我们的检查“毛主席、党中央高兴满意”的结论为结论。会议结束后，在县团级传达贯彻中央4号文件时也非常顺利。全省军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九大”以来山东的工作充分肯定，全省形势很稳定。在酝酿和选举党的“十大”代表时，经全区部队广大党员的民主协商和军区四届六次党委扩大会议选举，我被当选为“十大”正式代表。

这样的局面，少数跟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投机有野心的人，还有江青帮派体系一伙，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串通一起，内外勾结，上下呼应，密谋策划，继续制造新的阴谋。

4月10日，省委秘书长、康生的儿子×××X报告我们说：“省委一名副书记额上长了一个痣，诊断为良性，拟去北京进一步检查。”当天下午4时，我和杨得志同志前去看望，并为其去北京送行。后来才知道，南郊会议结束才11天，他的北京之行，看病是借口，实际上是去找江青一伙密谋策划，进一步整我们。因他当时是副书记，不便明着越过我们去北京找江青一伙，就以看病为名，暗中勾结。他一到北京，姚文元亲自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他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宴请他吃饭、看电影、照像，面授机宜。后来，他自己情不自禁地说：“我在北京养病期间，中央首长告诉我，山东问题很严重，你回去以后要很好地落实政策。”

5月19日，省委和军区五位常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主要是批林整风和召开“十大”的问题。我们一下飞机，已在北京“养病”的那位副书记，早从江青一伙那里领受了旨意，他放风说：“杨、袁那个问题没有完”，其用意是动员别人准备攻我们。我听到以后，沉住了气，主动请示总理：“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个检查？”总理说：“你们去年在北京作了检查，回济南又作了检查，群众已经谅解，这次就不要再检讨了（实际上，我们还是作了检讨，印发了简报）。”我又告诉总理：“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被提名为‘十大’代表候选人。”总理说：“你们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按党的惯例，上届委员是下一届的当然代表嘛。”总理的指示，又一次打破了江青一伙妄图借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整我们的阴谋。

但江青一伙并未就此罢休。会后，江青对那位副书记说：“你不能只管粮、棉、油，不管纲和线，要抓路线斗争，要发动群众。”从此，他和康生的儿子，更加频繁地与姚文元联系，把山东帮派势力的活动，暗暗捅给江青一伙，又把江青一伙的旨意，传递给帮派骨干，展开了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帮派活动。“九大”以后，平静稳定了三四年的山东，又卷起了波澜。

6月中旬，各地“文革”初期跟王效禹造反的少数人，借口“落实政策”，开始重拉队伍，寻机闹事。

6月17日，纪登奎在二、六机部召开的一次有全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指责我，“有一个人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痛哭流涕。”这些话通过山东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快传到了省内。

6月18日，在省委和济南市委门前，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指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不批林，矛头指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揪出林线人物”，扬言“决一死战”。到7月5日，省、市委门前贴出了第五批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攻击我，“不打倒袁升平，誓不罢休！”7月7日，在帮派分子策划下，王效禹的得力干将×××的妹妹×××和帮派骨干×××的老婆×××等人，“里应外合”，到省学习班抢走了×××，并要前去抢×××。我们召开省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面将×追回，制止抢×。7月8日，枣庄帮派势力煽动140多人来济南上访静坐，我们一面对闹事的人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和措施报告中央，但帮派分子不但不听，反而越闹越凶。7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导演，帮派头目×××、

×××等30多人以“上访”为名，赴北京告状。

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劝说他们有问题回山东解决，他们根本不听，说什么“上访是革命行动，不准阻拦，不准扣发工资，不准歧视”。他们说假话，递假材料，大肆攻击说，“杨得志、袁升平镇压了造反派”、“依靠走资派掌权”，“坚决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只有依靠造反派才能解决山东问题”。其实，这是早已导演好了的闹剧，这帮人先在前台摇旗呐喊，后台由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出面引见，为他们撑腰打气，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十分热情、十分亲切地接见”。他们违背总理的指示，将规定只发到县团级的中发〔1973〕4号文件拿出来“组织他们学习”，鼓励他们继续哄闹。致使这伙人受宠若惊，活动更加猖獗。《赴京上访纪要快报》、《中央首长接见的特大喜讯》等宣传品，很快传遍山东全省，局势进一步动乱。

这时，由于少数人闹事，多数人不得安宁，工厂有的半停工，有的完全停工，1800多人的山东造纸东厂，公开不上班到社会上串连的约70多人，去北京上访的16人。这些人虽少，但闹得很凶，打骂围攻干部群众，扬言要把厂里“翻个个儿”，搞得干部无法指挥，工人无法安心生产，特别是班组和车间骨干，处在第一线，挨打受骂，憋着一肚子气，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少数人的闹法不满，另一方面又对省、市委无法制止这些人闹事不满，他们提出，落实政策不能只顾少数人，而不顾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他们也看出，少数人闹事，上边有人支持，所以他们也提出派代表赴京上访，并表示，少数人如果继续打人，他们要被迫自卫。我们得知情况，立即召开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派人连夜做工作，稳定大多数人的情绪，不使局势恶化。

对于江青一伙鼓动少数人闹事，我内心是很反感的。认为他们高高在上，既不调查研究，又不相信各级党组织，不相信和依靠山东7000万人民的大多数，这么30多人上访闹事，他们就百说百听，作为依靠力量，否定各级党委。

7月18日，根据中央通知，杨得志、张铨秀、白如冰同志去北京“做上访人员的工作”。临行前，省委常委开会分析了社会动态，讨论了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会上，有人反映上访人员中提出了“支左转弯、支左检讨”问题，我说：“支左问题，总的讲，我们解放军是执行命令，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办事的，至于具体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有的今天转弯，明天调向，还有不少指战员挨了打骂，受了冲击，这些账不要算，也没有办法算，这是一笔糊涂账。”我说这些话，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可是不久，所谓“支左是一笔糊涂账”的问题，竟成了我的一条弥天大罪。

从省委开会回到家里，我脑子里一直还在想着如何做好上访人员工作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想找杨得志同志再说几句话，因为下午1点钟飞机起飞，他已经离家上机场去了，我又打电话给张铨秀同志，他正准备出发，我简要地说：“你们到北京后，一方面要耐心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不合理的要求，不能被迫接受。特别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十大’前把山东搅乱，搞权力再分配，这个问题坚决不能接受，要顶住！”因为他急着要走，我不能多说，但又怕没有说清楚，我便再打电话到机场找杨得志同志，他还没有到，是党委秘书接的电话。我把上述给张铨秀同志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并特别强调“方向路线错误”问题，不能随意表态接受，一定要顶住，要提醒杨得志同志，千万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不料，“要顶住”这句话，竟然被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为“顶中央”，成了“山东问题的根子在袁升平”的根据，并以此为幌子，造谣和挑拨杨得志同志同我的关系。

1973年8月8日凌晨2时，我突然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要我和苏毅然同志去北京，

同杨得志、张铨秀、白如冰同志一起开会，说中央拟解决一下山东问题。

当时，苏毅然同志正在青岛，中央派飞机先去接他，然后返抵济南接我，下午5时许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按惯例，过去每次进京，都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站，可这次只来了一个秘书，冷清得很。我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吱吱唔唔，先说秘密的很不知道，后又说情况很复杂。到了京西宾馆，见到军区工作人员，他们故意回避，不是装着没看见，就是绕着我走，只有一位同志低声对我说：“袁政委，情况复杂，您要提高警惕啊！”

我进了房间，杨得志、白如冰等同志来打了个招呼，便赶紧走了。离开饭时间还早，我想去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房间看看，可门都关上了。吃饭时，气氛也很异常，要么没话说，要么找话应付，瞎扯这菜怎样，那菜怎样。

晚7时，我想如果晚上不开会，应先了解了解情况，可是过道两侧的“邻居”都不见了，孤单单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秘书通知我，晚9时中央领导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两家常委参加。我问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我想白如冰同志会知道，敲敲他的门，没有回音，拍拍其它同志的门，也都不在，我一眼望见杨得志同志的屋里还亮着灯，心想，他在就好了。

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这时杨得志同志开门出来，我便走上前去。我们进了东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关了门，走向凉台。杨得志同志简明地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然后说：“今晚的会你知道吗？就是斗你！你要有精神准备，他们是不讲理的，一定会把许多罪名强加在你头上。”我说：“远的不说，在济南军区我和你共事13年，工作、品行、团结、友谊，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批评我的错误，我接受，无限上纲的，我不能接受，强加我的，我要说明情况，保留意见。”他又说：“这样的時候，是不会让你讲理的，你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发火。……古人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能讲话呢？”他知道我不了解会议的情况，便进一步解释：“老袁，我知道你是坚持原则的，可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啦。”

最后，我带着深深的感情说：“看来他们又在搞阴谋诡计，要在我身上开刀了。就是我坐班房，你在外面，不要忘记我们几十年的情谊，不要忘记现在你我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你讲话，这样，我就是坐班房，也没有怨言。”话毕，我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人们可以想像，在那样的时刻和场合，杨得志同志给我通个气，以鼓励和安慰，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晚9时，我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山东厅。

周总理宣布开会，可他的话音刚落，秘书同志进来请他去接电话，一去一个多小时。

姚文元首先发难，他重复过去的诬陷，无非说我“文化大革命表现一贯不好，不支持造反派，不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自命不凡，装腔作势，高谈什么“凡是林彪死党，凡是走资派，都是支持复辟的反动势力，支持保守派，袁升平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山东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总后台。”“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他要顶住。山东问题的根子就在袁升平。”

听了这话，苏毅然同志发言：“山东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全由袁升平同志一人负责，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张春桥立刻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讲嘛！”苏毅然同志并不知道江青一伙早已定好了调子，接着又说：“我还有两句话就完了。袁升平同志虽然是省委第二书记，但……”这一句话还没讲完，张春桥再次恶狠狠地训道：“我对你说了，你不要讲了！想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这么低！”姚文元也跟着喊：“你不要再讲

了!”

到会的也有几个人顺着江青一伙的杆子爬，但都没有讲出任何新问题，除了老调重谈，就是学舌、扣帽子。

我听了之后说：“大家对我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希望能把事情说明白一点，我好总结经验教训，也便于作必要的说明。”

江青一听，尖叫了一声喊道：“你还要民主！民主不会给你，你别想利用民主放毒！”

我又说：“今天是党的会议，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按党的民主原则发言没有错误啊。我只讲半个钟头。”

江青武断地说：“半个钟头也不行，今天没有你的发言权！”她不让我讲话。

张春桥一手拿着一叠材料，一手拍着桌子说：“你说‘支左错误是一笔糊涂账’，这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看，这是你们过去的检讨。”

我说：“运动初期，违心的检讨是写过。现在通观全过程，军队执行命令支左，方向没有错，具体工作错误难免，问题错综复杂，也很难分清是非，确实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见我还挺硬，有几个人便帮腔，打我的态度。当有人提到我老伴李涛同志的所谓问题时，江青拍着桌子大叫：“把他老婆弄来揭发问题！”

会议开到凌晨2时，我的态度还是那样，不让讲话也不低头。

在这些人对我高压猛打时，周总理一直没有讲话，他安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态度十分严峻。忽然，我听到江青用手指“突突”地敲着手表，中着总理大声说：“已经两点半啦！”总理这时才慢慢地对大家说：“那好吧，会议就开到这里。”他又有意识地说：“大家说袁升平同志有这些错误，提出来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改正了还是好同志。”说完，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主动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了两句：“冷静一点，有错误就改，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你也是老同志嘛，要注意身体。”握着总理的手，我坚定地表示：“感谢总理，我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做。”

这时，江青、张春桥也假惺惺地走过来，我转过身，扭头就走了。

刚过厅前的屏风，就有两个身着便衣的人，跟上了我，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来时，我和杨得志同志乘一辆车，这时车上变成了4个人。回到京西宾馆，那两个不速之客，一边催促我收拾东西，一边将我的刮脸刀、剪指甲刀、钢笔、老花镜都没收了。我拿起电话给我老伴李涛同志打个电话，他们压住分机没让打通。我被押送到西直门招待所，软禁起来了。

8月11日，宣布撤销我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9月12日，我老伴李涛同志也被骗到北京。名义上我俩住在一起，实际上将两间屋的门隔起来，夫妻之间说句话都登记在监护日记上。老伴看我吃不下饭，出去给我买点吃的东西，后面有人跟踪。我对老伴说：“现在中央被四个极左派篡了权，你要准备跟我把牢底坐穿。让我写检查交待，没什么新东西，不写了！……反正孩子们也都长大了，相信他们会在群众的教育下革命的。”我让老伴写了一份简历，每个孩子寄去了一份，让他们知道我从苦水里长大到参加

革命的一生，愿他们在革命的曲折道路上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做公正无私的人。老伴理解我的心情，泪如雨下，哭声不止。我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想着，想的问题很多很多……

我回忆了个人的一生，想起了17岁参加革命，在人民军队戎马生活的45年，想起了和山东军民同生活、同斗争的13年，特别是想起了毛主席1970年4月26日路过济南时，对杨得志同志和我亲切而又风趣地说的两句话：“你们这里现在升平了，过去不平，现在就平了嘛！得志了嘛！要谨慎小心。军队同志有时好急躁。雷厉风行是要的，搞政权的事情不能性急。”我们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山东搞了4年政权建设，同全省军民一道，从“文革”前期“全面瘫痪”、“全面内战”的混乱状况下，由乱到治，由反复到稳定，恢复和健全了党政领导机构，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区行列中，山东虽不很先进，但也并不落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怎么一夜之间，仅仅由于30几个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告状，这一切就都被否定了呢？！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党的结论，不是人民的结论。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越想越坚定地认为，千秋功罪，总有一天人民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于是，1973年8月16日、23日，我分别给周总理、毛主席写了信。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郑重提出：

……中央政治局于8月11日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还是不通的。山东问题由我一个人承担是不公正的。我坚信中央一定会遵照主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的教导，对我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自然，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8月29日，“十大”闭幕的前夕，总政一位干部部副部长，给我送来中发〔1973〕35号文件，宣布撤销我“十大”代表资格，并让我正确对待。我老伴插了一句：“一个电话就把升平同志揪来了，什么话也不让说，怎么正确对待？！”这位副部长训斥她说：“不准提‘揪’这个字眼！”我只说了一句话：组织上服从。

9月30日，林彪一伙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和“四人帮”死党、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我骗到北京远郊一个地方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临行前，对我全面搜身。当时我想看看正在发病卧床不起的老伴，他们说：“你前边走，她随后会来的”。以欺骗的手段将我弄上车，不让我们见面。

从此，我就销声匿迹了。在长达4年多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听不到党的声音，见不到同志们的笑脸，夫妻不准见面，儿女不准通信，只是蹲在黑屋里而无人过问。在江青一伙垮台之后，连当时负责审查我的中央专案组，也不得不坦白地说：“不了解监护审查的主要问题。”对我没有进行过审讯。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罪，上面叫办监护手续，我们就办了。”这段自白，除了说明“四人帮”陷害我的阴谋得逞了，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可见，江青这伙封建法西斯分子，践踏无辜，草菅人命，到了何等卑鄙、荒唐和发狂的地步。

1973年8月9日，我被关押在北京，杨得志同志等返回济南。江青一伙指令他们同进京“上访”的那三十几个人一同回去。当他们乘坐的伊尔18型飞机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的时候，康生的儿子×××，带头迎上前去，一一和他们握手，全场敲锣打鼓，欢迎“上访的英雄”。

这个消息，革命群众听到之后，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不工作、不生产，进京上访，

却有了功。搞这么大的欢迎仪式，这是压我们坚守岗位的人。那么我们都不工作、不生产了。”从此，在关押我的另外天地，在山东全省，兴起了更大的混乱，各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派性斗争。

1974年1月，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名，妄图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2～7月，已经登上山东省和济南军区“三个第一”宝座的那位副书记，大部分时间坐镇北京，紧贴在江青一伙的身边，遥控山东，同济南军区的那位司令员，一唱一和，毫不走样地传播江青一伙的黑旨意。他们上下合谋，盗用中央名义，给我罗织罪名，定我为“林彪死党”，但又做贼心虚，不敢呈报毛主席，也不敢用正式中央文件格式，山东军民称之为“黑十条”。他们按照迟群、谢静宜等搞的“北京模式”，指挥山东地区的“批林批孔、揭袁批袁”运动。实际上不批林、不批孔，专搞“揭袁批袁”。他们把江青、迟群搞“三箭齐发”的讲话，当成行动指南，把王洪文“批林批孔要解决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谬论当成“中央新精神”，把军外“特务记者”插手军内问题当成“新经验”，大量印发所谓《袁升平罪行材料》，召开全省军内外广播大会，搞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揭袁批袁运动”。他们不凭丝毫事实，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信口雌黄地诬陷“袁升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是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和我区的代理人，是林彪的死党，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林彪大小舰队的保护伞，是山东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当时济南军区的那个司令员并造谣诽谤我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江青一伙妄图杀人灭口制造舆论。他们大搞封建株连，残酷迫害我的亲属和大批革命干部、群众。

我的老伴李涛，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出于义愤，为我鸣不平，写信痛斥落井下石者对我的诬陷，江青一伙竟然动用专政机关，宣布她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达4年之久。我的孩子要求请假来看看父母，遭到无理阻拦，她们自己买了车票来京，竟被“通缉”追回。姚文元发现我老伴给家里秘书打了电话，指令保卫部门说：“要把袁升平的黑据点撤掉！”从此，无辜的幼儿都被强迫参加了“学习班”，勒令揭发交待问题，服兵役的被退役，上学的被清除出学校，当干部的降为工人，无一幸免。我的秘书刘旭同志，江青以“庇护袁”的罪名，指令××亲自到山东抓捕，武装押解北京，投进黄寺监狱。“四人帮”的死党徐海涛亲自审讯，没有得到丝毫满意的“口供”。关了两年之后，胡乱当成“林彪办公室”人员“赦免”释放，流放到山东当时最穷的鲁西南。

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况开田同志，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因为他不支持江青一伙的歪门邪道，王效禹之流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指使一伙人进驻后勤大院，提出“打倒况开田，吃饭不要钱”，杀猪宰羊，吃光抢光。还把武斗的死尸抬到况开田同志的床上，栽赃陷害。并且把他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帮凶’”，竟在他身患重病之时，关押起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丁瑞光同志，从事军队宣教、党务工作，只因和我有工作关系接触较多，只因坚持党的原则。竟被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关进监狱，一家人挨整。政治部秘书长张群章、保卫部长晋国强、宣传部副部长周克玉同志，也仅仅是因为同我有工作关系，被打成“袁升平的人”，入狱审查。整个军区政治部被打成“袁升平的庇护所”，深受其害。

“四人帮”放火烧荒，重点烧军区，大批指战员无辜挨整。当时军区党委常委中，有张钰秀同志等5名被点名批判，有的所谓“罪行材料”印发到军内外基层单位。50多名师以上干部或被关押审查，或被点名批斗。基层干部、战士遭受非法关押、批斗、殴打、处分，非正常转业和复员的更是不计其数，冤案空前。

在省里，通过“揭袁批袁”，“放火烧荒”，把“九大”以来成立的全省生产大队以上的各级

党委和支部，统统打成“以袁划线的产物”、“袁式班子”、“袁式党委”，大批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袁升平的人”。枣庄市委三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审查一起反革命案件，因为触及了打砸抢分子，诬告信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反诬三级党委“制造枣庄反革命黑案”。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成了“无罪”，受理案件的三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宗国治、张增华等10位同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江青一伙的李震专程去山东抓来北京，关押21个月，以此追查我的后台。在黄寺监狱里搞逼供信，活活整死1人，精神失常3人，家属子女和枣庄许多干部群众和支左部队指战员无辜被株连。因为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最后不了了之。

在大施政治迫害的同时，他们全面推行江青一伙的帮派路线。全省从上至下，以“补台”和“落实政策”为名，当年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和帮派骨干，大批地进入省市各级领导班子，掌了实权。“四人帮”的亲信×××等，被保荐连任或提升为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有人命案的在押犯×××、×××，被“放虎归山”，重登政坛。“十年一贯制”，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等人，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还被推荐提拔为外省的副书记。并且大搞“突击提干，突击纳新”，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加速部署搞“双突”，限时间、限年龄、限职务，提拔和纳新大批帮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仅济南市就提纳500多人。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当年王效禹想干而没有干得了的事，现在干得很出色。”1976年清明节，他们配合江青一伙在北京镇压“天安门事件”，禁止全省群众悼念周总理。青岛、济南等地，许多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共谋”，予以清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忠实地执行江青在12省会议上的黑指示，抢先“批邓”，成为“同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深受江青一伙的赏识，“京津沪辽鲁”并称。他们狂热推行江青一伙的阴谋文艺，“打走资派，写走资派”。他们还以反军乱军为目的，“学上海经验，搞第二武装”。以当年王效禹的“文攻武卫棒子队”为骨干，全省上下搞起了“民兵指挥部”，同解放军相对立，夺走了部分人武部的权。

在这些狂热运动的冲击下，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被压抑，积极性遭受打击，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铁路、公路停运、半停运，交通运输堵塞。社队被夺权，祸及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由1970～1972年的全国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产量产值之低，为山东建国以来之最。社会秩序之乱，为“文革”以来之最，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那段时间内，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十年内乱期间，山东军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篡权与反篡权斗争的必然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四人帮”加上他们的顾问康生，5个人有4个半祖籍山东（江青、康生祖籍诸城，张春桥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随其老子姚蓬子长期混居青岛），这伙人妄想把山东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后院”，作为“复兴基地”，“突破山东，夺取华东，以至全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置于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